

由《燕行录》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

——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为中心

谷小溪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保持典型的“册封一朝贡”关系。但在传统华夷意识的影响下,朝鲜使臣对待清朝的态度远不像对待明朝那般恭谨虔诚,表现出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迫于满清的政治压力履行历年的朝贡义务;另一方面,基于“小中华”和“礼仪之邦”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又对文化底蕴相对贫瘠的清人持有排斥的情绪。康熙五十九年和雍正十年,朝鲜文臣李宜显两次以正使身份赴清,根据沿途见闻撰写了使行日记《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两部作品逼真摹绘了18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并将笔触深入士人群体的内心世界,再现了以燕行使臣为代表的朝鲜士人的华夷观,可作清代朝鲜士人文化心态研究之益助。

关键词:《燕行录》;华夷观;清初朝鲜士人;《庚子燕行杂识》;《壬子燕行杂识》

中图分类号: I269.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3)06-0096-05

有明一代,朝鲜奉行“事大保国”政策,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册封一朝贡”关系。壬辰倭乱后,朝鲜感念明朝的再造之恩,将追慕中华道统与感戴皇明的信仰推向了极致。随着建州女真的崛起,明朝与周边属国稳定的宗藩关系逐渐脱节,朝鲜不断遭受后金的政治威胁,最终在丙子之役后沦为满清的藩属国。因循明律,朝鲜仍定期派遣使臣赴清纳贡,但在儒家传统华夷观的影响下,朝鲜使臣对清朝的态度远不像对待皇明那般恭谨虔诚,表现出异常复杂的心态。李宜显(1669—1745),字德哉,号陶谷,祖籍龙仁,朝鲜著名文臣和学者,曾历仕肃宗、景宗、英祖三朝,官至领议政,谥文简,有《陶谷集》传世^[1]。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一月和雍正十年(1732)七月,李宜显两次以正使身份赴清,并根据沿途见闻撰写了使行日记《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作品中李宜显逼真摹绘了18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广

阔图景,还将笔触深入士人群体的内心世界,再现了以燕行使臣为代表的朝鲜士人的华夷观念,可助益于清代朝鲜士人文化心态研究。本文以李宜显两部《燕行杂识》为基础,间以其他作品为参考,对宗藩体制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念试做阐述。

一、思明情结——华夷观念的表现形式

后金崛起后,国势弱小的朝鲜饱受政治欺凌,最终屈从于满清的统治。但综观清初近百年光景,朝鲜士人对清朝始终秉持复杂而疏离的态度,赴华使臣由“朝天”到“燕行”意识体系的转变即能深刻反映这种心理趋向^[2]。基于对儒家传统华夷观的群体认同,清初朝鲜使臣普遍怀有强烈的黍离之悲与思明情结,这种感触在异域绵长的孤寂中不断外化并投射于当事人的言行,最直观

收稿日期:2013-08-15

作者简介:谷小溪(1984—),女,辽宁锦州人,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的表现就是朝鲜使臣与清初世人的交往经历。赴华途中,朝鲜使臣与明清官员百姓等频繁接触,双方的沟通主要借助翻译口述和诗文笔谈两种渠道得以实现。由于言语不通,历届朝鲜使臣均有译官随行,通过译官之口与清人顺畅地交流思想,追慕皇明的心迹也往往寄寓其中。如《庚子燕行杂识》记载,康熙五十九年(1720)某日,李宜显随使团抵达永安桥,夜宿军卒常玉琨家。通过攀谈李宜显得知常玉琨是明初鄂国公常遇春的后人,遂问道:“你是明朝人子孙,独无思旧之心耶?”常玉琨答曰:“已顺他人也。”^{[3]351}李宜显闻言唏嘘不已,赋五律一首曰:“圣祖涤腥氛,鄂公功最闻。傍枝今幸遇,远派尚能分。循发悲胡服,低颜愧驸军。重阴终必廓,倘更佐风云。”^{[4]169}此类对话在清初《燕行录》作品中屡见不鲜,将之摘取对比就会发现其用意之深。如顺治二年(1645)朝鲜执义成以性赴燕,在拢牛桥询问汉族士人高美“北京陷没时,亦有死节者否”,又问及崇禎子女下落和南明政局^[5]。康熙七年(1668)朝鲜持平朴世堂赴燕,在沙河驿询问姜秀才“皇帝亲政后民心如何”,又问明裔在羌胡和顺治长子在西鞑的传闻可否属实^[6]。当他们得到与预期相悖的答案时会顿生凄然之感,可见看似散漫的闲话绝非无心之谈。通过笔谈,朝鲜使臣有意识地搜集时政信息以便归国后禀奏君王,其焦点在于两个方面——清初汉人心态与国家时局。如前所述,朝鲜虽在清人的政治威慑下缔结宗藩关系,高昂的民族自尊与儒家传统华夷观的感召又使其不甘匍匐于“蛮夷”的统御之下。清初数十年间,朝鲜国内反清复明、北伐雪耻的声浪不断高涨,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朝鲜的北伐梦想才宣告破灭。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成以性的乙酉之行正值清人初入中原、人心思明之际,对“死节者”与“前明皇裔”的期冀潜隐着朝鲜君臣光复明室的薪胆大义。朴世堂的戊申之行正值朝鲜“北伐论”大兴之时,康熙登基未久,大清社稷仍隐患重重,对康熙亲政与边疆传闻的探问,显然是为“北伐论”的可行性寻找舆论支持和现实依据。李宜显的庚子燕行已值康熙末年,随着三藩的平定和台湾的收复,太平盛世的初景日渐消解了汉人的光复之心。朝鲜君臣也对北伐雪耻的宏业不再抱有幻想,但从情感体验来说,他们仍对屈身“清夷”的处境深感羞耻。可见“思旧之心”的探问,正是朝鲜士人黍离之悲与思明情结的表征。“已

顺他人”的回答,则是朝鲜士人最不忍接受的汉人宗明情感的弱化。

明清时期,朝鲜使臣与中国官吏、学者交流频繁,囿于语言障碍,双方逐渐摸索出笔谈的方式,即以笔墨纸张和共识的汉字作为媒介来传递思想。笔谈在《燕行录》作品中占有较大比重,其内容宏富,涵义深远,涉及政治、文化、风俗等多重领域,饱臻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深沉感悟。衣冠礼制是燕行笔谈涉及较多的话题之一,看似寻常的事物透露出朝鲜士人对前明文化秩序的认同和对满清文化秩序的排异。如《庚子燕行杂识》记载,李宜显夜宿榛子店民宅,与秀才马倬笔谈,当问及朝鲜使臣所穿衣冠如何,马倬“显有愧屈之色”,赧颜答曰:“我们未尝不羨,但我们遵时耳。”^{[3]361}《壬子燕行杂识》也记载,雍正十年(1732)某日,李宜显夜宿丰润县民家,与生员王天寿笔谈,当问及“吾衣冠何如”,王天寿答曰:“衣冠如前代,吾等不幸而生斯世,又幸而见大人也。”李宜显认为王天寿的话语“不无思汉之意”,遂“心以为嘉”,无比自豪地答道:“吾衣冠,乃是箕子之旧,即古中华礼服也。”^[7]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衣冠不仅是服饰穿戴等物质概念,还承载着伦理道德层面的文化内涵。洪武元年,太祖朱元璋“诏复衣冠如唐制”,使“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8]。其后朝鲜数次遣使求取官服,改从明制。满清建制后对汉人实行剃发易服政策,对周边藩国则屡加恩典,尊重各自的民族信仰,加之朝鲜坚持遵循明朝礼制,才使大明衣冠制度在朝鲜得以完存。清初朝鲜使臣燕行时对汉人易服的情状怅惘不已,面对身着旧时装束的邻国来使,汉人的态度也由最初的垂泪叹息^[9]到艳羨起敬^[10],最终被异族文明同化为“遵时”与“变通”^{[11]218}。随着满清政权的巩固和舆论钳制的严酷,汉人的思明情感时光流逝而淡化,但面对古风犹存的朝鲜使臣,双方的内心难免再起波澜。就汉族士人而言,每当出现这种看似边缘的象征物,“就会在无意识中唤起深藏于心的族群记忆”^[12]。而就朝鲜士人而言,慕华思明的情愫使其为保留“箕子之旧”而骄傲和欣慰的同时,又为“中华”臣服于“蛮夷”的现实堕入感伤的旋涡。李宜显还提到,在清朝无论男女老幼何等民族一律身着胡服,“而见画本,虽画近来人物,冠帽皆悉依汉仪,于此可见虽不得已从时制,而心实歉然也。”^{[3]452}可见朝鲜士人对汉人“遵时”的心态已多了几分理解与宽容,也从反

面印证了朝鲜士人渴求道义同盟和价值认同的复杂心情。

二、正统意识——华夷之辩的核心内涵

东亚藩国中,儒家传统华夷观对朝鲜的影响最为深远。早在三国时代,新罗已遣使入唐,“请袭唐仪”,“以夷易华”^[13]。高丽时期,太祖钦定训要曰:“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高丽史·太祖一卷一》)朝鲜建国后对明朝奉行“事大字小”之礼,入贡次数最频繁,态度也最恭谨。朝鲜尤其重视汉文化的研习,士人皆精通儒家经典,于汉文学创作上颇有造诣,朱子之学的传入更是朝鲜思想史上一大盛事,自此尊王攘夷等儒家纲常被奉上不可亵渎的神坛。在事大之礼与慕华情结的双重作用下,朝鲜士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优越感,自诩为儒家礼乐文化的正脉,以“小中华”自居^[14]。由此,他们对文化底蕴相对贫瘠的少数民族怀有居高临下的蔑视感,以蛮夷、禽兽视之。明亡清兴的剧变使朝鲜士人的华夷观念遭受颠覆——礼仪之邦受制于马背民族实乃奇耻大辱。这种狭隘的民族自尊被不断强化并投射到朝鲜士人的价值体系中,唤醒了儒家正统意识的捍卫与高扬。赴燕途中,朝鲜使臣尽阅满清风俗,对这些近距离接触的景致持有否定乃至鄙夷态度。如《庚子燕行杂识》中,李宜显在玉田察院见到康熙皇帝亲制训飭士子文,评价道:“其言颇典严,得训谕体。胡而如此,亦可异也。”^{[3]364}康熙皇帝本是才情卓越的君主,清初亦不乏优秀的满族文士,李宜显对清人的文才持质疑态度,显然怀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又如入京后使臣前往弘胪寺,目睹满朝文武效仿明制朝拜君主的情景,李宜显赋诗嘲讽曰:“局束初呈表,低垂更习仪。羞深跪堂际,愤切叩头时。可笑倡家礼,犹因汉代规。回看尤觉厌,红额衬冠纓。”^[4]清初因袭明制本是统御国家的明智之举,而在朝鲜使臣眼中不过是沐猴而冠的闹剧。他们本能地认为,无论“夷狄”怎样攀附儒家礼义,也无法抹杀其卑贱的血统和愚顽的天性。由此可见,在所谓正统意识的统摄下,朝鲜使臣对满清文化的理解与接受尚需要漫长的磨合过程。

朝鲜使臣对清人形象的描述也时常带有负面色彩。在《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中,李宜显对清人多以“建虏”、“胡人”等贬抑性的字

眼呼之,对大清天子亦直言不讳地称为“胡皇”。关于清人的外貌行止,李宜显描述道:“清人大抵丰伟长大,而间有面目极可憎者,膻臭每多袭人,言辞举止,全无温逊底气象,汉人则颇加敛飭。”^{[3]460}李宜显对其他“胡人”也颇感嫌恶,如对蒙古人的描述:“所谓蒙古,广颧隆颊,容貌诡异。衣裘鹿污,恶臭袭人。虽间席而坐,心中甚觉秽恶。”^{[3]385}可见满蒙等马背民族给予朝鲜使臣的情感体验是颇为丑陋粗鄙的。客观来讲,满蒙皆属游牧民族,其体貌特征与本民族善游猎、耐风寒的生活习性相关,李宜显富有排他性的评述是有失公允的,也从另一角度揭示了朝鲜士人对尊华攘夷正统意识的遵从。

此外,朝鲜使臣对清人习俗也多有指摘。在《庚子燕行杂识》中,李宜显用一半篇幅介绍清初风俗并加以评论,时有鄙薄之语。如论及清人养狗:“胡人最重狗,人与狗同宿一炕,甚至共被而卧。路中有一胡人家甚华侈,壁张彩画,炕铺红毡子,而狗乃游行其上,见之可丑。又于领赏日,见狗与胡人相错于班中,尤可骇也。”^{[3]460}清人敬犬的习俗与萨满教的图腾崇拜有关,也是满人世代逐水草而居、靠渔猎为生的民族特点决定的。李宜显完全从儒家伦常的立场进行权衡,感慨“中州文物,尽入毡裘”^{[3]462},正是贵华贱夷的观念作祟。同样,康熙六十年(1721)朝鲜左参赞李正臣赴燕,描述清人丧制时嗟叹“夷狄之习,见之可骇”^{[11]243};雍正三年(1725)朝鲜司仆正赵文命赴燕,在通远堡与汉人卢成进谈论丧葬嫁娶之礼,称其“若此语者,不可以夷狄待之”^[15];康熙二十五年(1686)朝鲜司仆正吴道一赴燕,在玉田县遇见汉族士人,悲叹“局以侏离之俗,渐染羯羶之习,虽有高世之姿,绝人之才,终于夷狄而止耳。”^[16]都是以汉家之足,试清人之履,脱离了满族文化的特有语境。习俗本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其美丑善恶没有绝对的评判标准。朝鲜使臣对满清习俗总体上持否定态度,并将儒家礼义的沦丧归咎于“蛮夷”的统治,这种思维定式根源于儒家华夷观念体系下朝鲜士人对满清文化的臆想与误读。秉持贵华贱夷的先入之见,将满清习俗置于儒家正统意识的天平上拷问,进而产生了朝鲜士人眼中错位的清初世风。

三、以史为鉴——华夷秩序的重构途径

我国自古有讽喻、诗教之说,这一文学传统在

崇奉汉文化的朝鲜得到极好的传承。燕行途中朝鲜使臣时常借古讽今,将深沉的兴亡之感融入诗文,给予朝鲜君臣某种启示。如《庚子燕行杂识》记载,李宜显随使团行至宁远城,一览祖大寿、祖大乐牌楼之盛,祖氏兄弟屈膝降虏、变节贰臣的遗事复归眼前,不由得吊古伤今,慨然叹曰:“其时建虏方肆,而大寿等身居戎阃,不以国事为念,争巧竞胜以夸耀一世,何哉!况其曾祖镇、祖仁、父承训俱为名将。而承训壬辰救我国有功,大寿、大乐以同堂兄弟,力战凌河,功亦不细。而末乃屈膝虏庭,隳其家声,惜哉!”^{[3]356}又赋诗曰:“身作降俘忝将门,斫成何物屹然存。圣朝谬奖承先代,名祖应羞有是孙。可笑奢华侔藻税,即知夸翫负师垣。经途剩博人争骂,四世铭勋忍背恩。”^{[4]174}李宜显对祖氏事迹的感言,正是对朝鲜统治者戒奢靡尚节俭,以社稷为重、勿沉湎荣华的婉劝。又如雍正三年(1725)赵文命赴燕,于山海关登临览古,眼见物是人非,不觉怅惘失神,还朝后向英祖呈奏《燕行日记》,痛陈“崇祯之末,关钥一启,胡骑长驱,遂使数百年衣冠文物,沦陷为腥膻之域。当时守此城者,安得辞其诛责,而山河城池之有不足恃者,益可验矣。”^{[16]170}由山海关沦陷之旧事,悲慨金汤之城毁于庸将之手,其中劝诫英祖知人善任、亲贤远佞的深意不言而喻。此外,朝鲜使臣还善于揭露清朝社会弊端以作警示。如李宜显在北京游赏满族官员图纳府邸后,对其奢华生活大加诘责:“穷奢极侈如此,其能终始安享富贵否?”途经满清朝贵墓园时又言:“然一园所费,要不下千金,贵介势家之竞尚侈靡,于此可见矣。”^{[3]375}类似的陈述又如赵文命在通州目睹藩国朝贡时华美楼船穿梭如织的盛况,感叹康熙皇帝“玩物丧志”,并讽谏曰:“帝王家一令一事之初不可不慎者有如是夫。”^{[16]170}在朝鲜士人看来,君主用人不淑,官员竞奢贪生等顽疾对大明江山的沦丧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清人虽然一统天下,终究是剽悍尚武的“蛮夷”,缺少礼仪之邦的睿智和气度,威加海内只是短暂的荣宠,“胡无百年”才是难逃的宿命。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这种观念,自然掺杂了民族情感的因子而有失理性的辩证,但我们可以窥见,清初朝鲜士人正是在其主观营造的文字乌托邦中不断追溯着前明的辉煌与没落,思忖着满清的鄙陋与寡寿,并将自身视为重构华夷秩序历史使命的先觉者和力行者,以明亡清兴之教训警示朝鲜君臣防微杜渐,运筹长远,护佑中华礼制的延续。

结 语

如前所述,在儒家传统华夷观的影响下,以燕行使臣为代表的朝鲜士人对清朝表现出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慕华事大的情感使朝鲜对曾有再造之恩的明王朝深怀效忠之心。另一方面,素有“小中华”之称的朝鲜信奉程朱理学,儒家尊王攘夷的正统意识已成为群体共识。当明清鼎革的剧变颠覆了“亘古长存”的真理,朝鲜士人旧有的价值体系遭受致命的冲击,继而对传统华夷观念重新展开定位。首先,朝鲜士人普遍怀有强烈的黍离之悲与思明情结。与汉人隐晦的情愫不同,朝鲜士人受到清朝的政治文化钳制较少,倡导“北伐论”的社会环境也使他们的思想更加自由与亢进。其次,尊王攘夷的正统意识和朝鲜士人固有的文化优越感促使这一群体对清人及其他“蛮夷”持有居高临下的蔑视心态,邦交上的宗藩关系不但难以弥合这种文化偏见,反而从某种意义上刺激了朝鲜士人潜在的政治自卑感,他们越是无法面对“蛮夷”统治的现实,就越发排斥“蛮夷”的思想文化,久之便形成了“礼仪之邦”重构华夷秩序的历史使命感。通过燕行朝贡,朝鲜使臣了解到清朝的政治局势与社会风貌,常以明亡清兴之教训讽谏、警示朝鲜君臣,成为其重构华夷秩序的重要途径。此外,在朝鲜士人心中,贵华贱夷、尊华攘夷等传统华夷观念始终存在,但由《燕行录》作品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清朝基业的巩固,特别是清朝“抚藩字小”政策的实施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朝鲜士人的思明情结与排异思想渐趋弱化,对清朝的认知也更加全面和客观,为朝鲜“北学论”的兴起和中朝文化交流的繁荣铺叙了前奏,新的东亚文化秩序亦随两国宗藩关系的稳定而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 [1][朝鲜]安钟和. 国朝人物志[M]. 首尔:明文堂出版社,1983.
- [2]葛兆光. 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J]. 中华文史论丛,2006,(1):29-58.
- [3][朝鲜]李宜显. 庚子燕行杂识[G]//[韩]林基中. 燕行录全集:卷35. 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 [4][朝鲜]李宜显. 庚子燕行诗[G]//[韩]林基中. 燕行录全集:卷35. 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 [5][朝鲜]成以性. 燕行日记[G]//[韩]林基中. 燕行录

- 全集:卷 18. 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160.
- [6][朝鲜]朴世堂. 西溪燕录[G]//[韩]林基中. 燕行录全集:卷 23. 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365.
- [7][朝鲜]李宜显. 壬子燕行杂识[G]//[韩]林基中. 燕行录全集:卷 35. 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512.
- [8]明太祖实录:卷 30.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条:525.
- [9][朝鲜]李宥. 燕途纪行[G]//[韩]林基中. 燕行录全集:卷 22. 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102.
- [10][朝鲜]闵镇远. 燕行日记[G]//[韩]林基中. 燕行录全集:卷 34. 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357.
- [11][朝鲜]李正臣. 燕行录[G]//[韩]林基中. 燕行录全集:卷 34. 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 [12]徐东日. 朝鲜燕行使臣眼中的中国汉族士人形象——以朝鲜北学派人士的《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146.
- [13][高丽]金富轼. 三国史记:卷 33[M]. “杂志二”. 首尔:乙酉文化社,1993:320.
- [14]李朝成宗实录:卷 20. “成宗壬辰三年七月乙巳”条. 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8:237.
- [15][朝鲜]赵文命. 燕行日记[G]//[韩]民族文化推进会: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 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
- [16][朝鲜]吴道一. 丙寅燕行日乘[G]. [韩]林基中. 燕行录全集:卷 29. 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170.

The Study on the View between “Hua” and “Yi” of Korean Schol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ngs of Journey to Peking

—Centering on Li Yi – Xian’s *Yan Xing Za Shi*

GU Xiao-xi

(College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Korean peninsula kept a “confer – tribut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H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View between “Hua” and “Yi”, Korean envoys took a complicated attitude to Qing dynasty which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ir respectful attitude to Ming dynasty. On the one hand, Korean envoys carried out the tribute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policy pressure of Qing dynasty. On the other hand, based on the sense of cultural superiority of “minor China” and “state of ceremonies”, they held a repulsive emotion to Manchu which had a less cultural deposit. In the 59th year of the reign of Kangxi and the 10th year of the reign of Yongzheng, the Korean envoy Li Yi – Xian went to China to pay tribute and wrote two diaries named *Geng Zi Yan Xing Za Shi* and *Ren Zi Yan Xing Za Shi*. These diaries described the broad picture of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and re – created the view between “Hua” and “Yi” of Korean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Korean envoys. Such works are beneficial to the study of Korean scholars’ cultural psychology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 *Songs of Journey to Peking*; the view between “Hua” and “Yi”; Korean scholar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Geng Zi Yan Xing Za Shi*; *Ren Zi Yan Xing Za Shi*

[责任编辑:郑红翠]